

黄荭:创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我

一踏进黄荭位于南大和园的家,记者就被她满屋子的法国文学书籍以及《小王子》的周边所吸引。黄荭如数家珍般向记者介绍这些书籍以及周边的来历,“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《小王子》,他们总是会给我带世界各地与《小王子》有关的东西。”

最初怀着文学梦的黄荭,在法语文学中找到了栖身之地,她翻译自己喜欢的文字,同时也写下自己在翻译、阅读、研究的文学生活中的感悟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中,她以匠人精神细细打磨语句,为读者们传递法语文学的浪漫与热烈。

现代快报+ZAKER南京记者 张焱任 实习生 刘敏/文 牛华新/摄



01

作为杜拉斯的资深研究者,黄荭刚开始并不太喜欢这个法国女作家。

“我最初接触杜拉斯,是和袁筱一一起翻译《外面的世界》。”这是一本杜拉斯的报刊文章、序言、书信、随笔的合集,内容非常庞杂,黄荭当时翻译得非常辛苦,因为涉及的专名和背景知识特别多,而当时的网络和搜索引擎又不像现在这么发达。“散文这一类的文本,文学性可能呈现得并不多,所以当时并没有认为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。”

随着黄荭对杜拉斯研究的深入,她越来越觉得杜拉斯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。“一方面杜拉斯是一个很正义的作家,她关注社会现实,她描写贫穷、描写一些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。另外一方面,她又很自我,她对爱情不顾一切地追求,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非常打动人的。”

黄荭是国际杜拉斯学会的会员,在这个规模并不大的学会中,黄荭收获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交流,“围绕着杜拉斯研究,但又像家人朋友的关系,很多会员之间都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。”

学会的第一届会长——米歇尔·波尔特,是杜拉斯生前的好朋友。杜拉斯1970年代拍摄《印度之歌》的时候,波尔特就担任过杜拉斯的助手。后来,米歇尔·波尔特自己也成为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位导演。2004年,波尔特将杜拉斯的作品《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》搬上了大荧幕。黄荭第一次参加杜拉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,组织者在会上就安排放映了这部电影。“电影给我的感觉跟书给我的感觉特别契合,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改编。”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是位于法国南部一个用石头砌成的房子里。

在午餐会的时候,黄荭对米歇尔·波尔特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喜爱。波尔特当即邀请黄荭夏天到她位于南部的家中做客,也就是《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》的拍摄地。那年夏天,黄荭来到导演的

家中度假。“我睡的床是杜拉斯到她家做客睡的那张床,床头柜上还放了一本帕斯卡的《思想录》,波尔特说这本书也是杜拉斯睡前会看的书。”

02

除了杜拉斯,黄荭还翻译过很多法国女性作家的作品,其中有波伏瓦的回忆录《岁月的力量》、科莱特的《花事》、内米洛夫斯基的《星期天》、萨冈的《冷水中的一点阳光》和她的女友写的《萨冈之恋》……作为一名女性,黄荭一直很关注女性生存状况,她所翻译的《两性:女性学论集》就是继波伏瓦《第二性》之后,法国女权问题研究的旗帜性著作。

2016年初,黄荭去巴黎参加一个关于菲利普·福雷斯特创作的学术研讨会。会后她拜访法国女性出版社,社长向黄荭推荐了女性出版社和女性书店的创始人——安托瓦内特·福克的这部代表作《两性:女性学论集》。安托瓦内特·福克,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,就是法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。

在《第二性》中,波伏瓦把女性受到的压抑比作“半个人类的奴隶制度”,认为女性一直受到男权社会的压制,只有让第二性获得和第一性一样的权利才能得到解放。而到了《两性》,福克却颠覆了波伏瓦的说法。她提出,根本不存在什么第一性、第二性,人类天生有两种性别。男性有男性的特点,女性有女性的特点。

在书中,福克也区分了平等和均等的概念。福克还提及了女性从政可能会有一个陷阱,“很多女性一旦走上领导岗位,她虽然是女性,但她可能会呈现出她男权的一面。所以福克又造了一个词,‘女儿子’。因为她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儿子的,是属于男性的,一旦女性获得了领导权的时候,她可能就会变成一个‘女儿子’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,因为她非常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。”这也是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道路上尤其需要警

醒的一个问题。

谈及女性写作的意义,黄荭引用了西苏在1969年获美蒂奇奖的作品《里面》中的两句话,“人必须保护生者和死者,因为死者也可能被杀死,他们可以被湮没,可以被无止境地抹灭。人必须通过写作或相当于写作的任何工作,想方设法‘向已逝的一切伸出救援之手’。”“写作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。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我、延伸着生命、倾听着生命、铭记着生命。写作是一人一生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。”

03

在成为一名译者之前,少年的黄荭一直怀着成为作家的理想。初中、高中的时候,黄荭写了很多诗歌,中间也有零星的发表。进入南大法语系后,单词语法等基础而又枯燥的学习也曾让黄荭觉得兴趣索然,但走进法国文学的世界之后,黄荭就真正爱上了这门语言,回归了自己最初向往的文学天地。

“我一直认为翻译家其实也是作家的一种,只是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作家那么纯粹。我自己也写过一些随笔、书评类的作品,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到底是‘六经注我’还是‘我注六经’已经说不清了,很多时候阅读和创作,或者说翻译和创作,它其实是糅合在一起,没有办法区分彼此的。”

对黄荭而言,工作与生活同样也是没有办法区分彼此的,就如她的微信签名——“无事花草,闲来翻书”。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,黄荭会在家做研究、做翻译,写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文章、书评,等等。闲暇之际,在家中的天台打理花草。

去年陆续翻译出版了《两性》《童年》《猫语者》,她愈发觉得闲来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,“现在感觉不是闲来翻书,而是忙来也翻书!时间真的如流水一般,不经意间它就流走了。现在要做的事情有很多,自己喜欢的作家、喜欢的作品也有很多,希望能够更多地译介到国内。所以相对来讲,可能和以前比起来会忙很多。”

那么纯粹。
我一直认为翻译家其实也是作家的一种,只是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作家



黄荭

法语文学译者,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,国际杜拉斯学会会员。译有《小王子》《人类的大地》《外面的世界》《然而》《薛定谔之猫》《花事》《猫的私人词典》《冷水中的一点阳光》《星期天》《波伏娃回忆录:岁月的力量》《多拉·布吕代》等作品,著有文集《一种文学生活》《转身,相遇》《闲来翻书》《经过》《杜拉斯的小音乐》。



扫码观看视频

对话

美好的翻译值得等待

读品:从事翻译工作这么多年,您对翻译的认识有没有变化?

黄荭:会有变化,而且我觉得包括自己的翻译风格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。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那种文字优美的文学,在翻译的时候,自己也会尽量去追求这种文字上的漂亮。但随着自己阅读量的增加,对文学的理解更加多元化,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去尝试更多的风格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,更加直白朴素的语言,会更加打动读者。

读品:您曾经说过,自媒体时代和快餐文化把整个社会的语言水平拉低了,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学和语言平庸化的时代。应该抵御这种平庸化吗?

黄荭: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经典、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回望?因为回望我们曾经有过什么,才知道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。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高峰在哪里,我们才会知道现在的低谷在哪里。在某种程度上,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。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,是需要一代代读者不停地去阅读,需要一代代的读者重新注入自己个性化的阅读感受,只有这样经典才会得以流传。如果说经典只是供在那里,那么很快就会消亡。为什么莎士比亚到现在还经久不衰,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会上演莎翁的戏剧,都会用自己的方式,或者说以自己的语境去重新诠释同样的文本。包括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会去看《荷马史诗》,那是因为《荷马史诗》里面描写的战争、冒险、迷失和回归,其实都是非常现代的一些主题。

读品:从整体上您怎样评价国内现在对外国文学的翻译情况?

黄荭:我觉得还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从19世纪末开始,经过新文化运动,到民国时期,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,中国译介外国文学,一方面作品数量非常多,涉及的作家也非常多。而且中国出版社或者说中国的译者对外国文学的选择,眼光很高。翻译质量的话,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现在是一个快餐时代,出版社引进得快,出版也很快,所以必然会要求译者翻译得也很快。追求速度,译文可能就缺少了必要的打磨过程,有一些翻译就会显得比较粗糙。想要有非常好的译作的话,真的是要译者能够静下心来,然后花时间进去。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值得等待的东西。

读品:您会出于什么标准来选择翻译作品?

黄荭:从1990年代以后,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得越来越充分,越来越全面。现在很多译者,像我自己,常常可以直接介入到选题这个环节,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来翻译。把自己想要翻译的国外的作家和作品介绍给国内的出版社,然后国内出版社买版权,跟你签合同,然后你去翻译。在这一点上,我很幸运。我自己做了很多翻译选题,也得到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,比如圣埃克苏佩里妻子莫苏萝·德·圣埃克苏佩里写的《玫瑰的回忆》,就是我自己做的选题。我本来是希望2020年可以推出自己独立翻译的圣埃克苏佩里作品全集,作为作家诞辰120周年的献礼,但因为这些年教学工作和各种翻译都很多,所以这个翻译计划一拖再拖,所以我现在把规划又往后推了10年,希望2030年可以推出我翻译的圣埃克苏佩里作品全集。

大读家

读书人,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